

韓 素 英 著

楊 青 譯

2001年的 中國

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



111
E012
454

韓素英著 楊青譯

2001年的
中國

香港南粵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的中國

韓素英著 楊 言譯

出版：南粵出版社

香港北角馬寶道六十六號二樓

印刷：大千印刷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七號五樓

一九七〇年六月版 每冊港幣二元

前 言

這本書是我在十年時間中訪問中國的結果，在這十年時間中，我一共訪問中國十一次，每一次的訪問，歷時兩星期至三個月不等。同時，這本書也記下了我在中國廣大城鄉地區參觀時所收集到的資料。

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特別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來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使得人們對中國的每一個事件所作的研究，容易落在時間的後面。本書的篇章，打算給關心中國的發展的人作一個初步的情況介紹。

外國對中國所作的許多研究，其致命傷在於：把從研究西方和蘇聯的發展所得的評價標準和推斷，用來對待中國的發展，這種研究前提，也許應該受到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徹底的質疑了。

韓 素 英

一九六七年三月

目 錄

前 言	一
從中國的歷史看將來	一
改造中國大地的鬥爭	二九
中國工業建設的新天地	四六
中國的科學研究工作	六六
政治掛帥的中國	七一
井岡山道路	八八
中國的年青一代	九六
國際舞台上的中國	一〇五
中國和世界	一一六

從中國的歷史看將來

《人類的四分之一》一書的作者迪克·威爾遜寫道：「關於中國，在過去，我們習慣於忽視它，不問它的想法和感受如何。我們熱衷於自己的振興，熱衷於自己妙想天開的想像。」

還只是在二十年以前，任何一個在中國居住過的人，都會記得起那時候流行的對中國人民的傲慢和種族優越感。一些人認為中國人民是柔弱、怯懦、迷信、沒有組織能力、腐敗和靠不住的。今天，「中國人已經起了變化了」，這種變化使人感到震驚，因為它是出人意表的。曾經對別的民族和階級逞威作福的民族和階級，總認為它們君臨別人的優越感是理所當然的，而當事物已經有了發展變化，它們的統治被推翻了以後，它們總是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脅。此外，今天在西方國家學校中講授的歷史課鬼把戲，是在十九世紀歐洲中心主義全盛時寫定的；因此，迄今所已經發生的變化，就給這種過去的態度弄得含糊不清；西方國家學校中的青年人，按照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世界的模子在塑造着。

中國的出現及其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影響着人類的將來，使每一個國家的政府都爲

之矚目；但是，中國的出現及其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依然被一些人認為有點麻煩，有點可怕。

在過去十多年當中，中國不斷證明了別人捏造的有關說法是虛妄的；中國的發展速度之快，使得任何一本報道中國情況的書都顯得跟不上時間。羅伯特·吉利安說過：「要了解中國，得先承認中國。」他的精闢之言，不但是說要在外交上承認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要平等對待，而且應該擺脫傳統觀念的干擾，承認中國的觀點、世界觀、民族精神、政策及其在國際上所起的作用。因為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這四分之一的人口有教養，有知識，有高度的自覺性，對馬克思主義抱有巨大而強烈的信心，對人類懷有強烈的責任感。

有人抱怨說，由於它的複雜性，由於它自甘於孤立，中國「是不好了解的」，這種說法必須加以批駁，因為這樣作的並不是中國，而是頑固地拒絕承認事實的西方國家。中國並不孤立，除了別人竭力企圖去孤立它以外，它也並沒有什麼複雜，對別的許多國家，也不能這樣說，倒是那些詆譏中國的人，有着許多的複雜性，這是必須加以克服的。

從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勝利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中國却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它的領土台灣依然為擰走了的蔣介石所盤踞，並且成了美國的一個基地，美國及其盟國英國

直認不諱地宣稱對中國實施遏制政策。沒有一個具有自尊心的國家會認為這種情況是「正常的」。然而却有人指望中國聽之任之，而當它提出抗議的時候，就被認作是「蠻橫」。

五十年前，甚至是二十年前，亞洲國家的命運是在歐洲決定的，是在美國決定的。今天，中國的出現，並且正是因為中國的出現，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世界的這些地區，人民的需求變得愈加廣泛，造反的呼聲愈加高昂）發生了日益巨大的變化，這標誌着這個時代是一個大動盪的時代——世界革命的時代。隨着中國的發展，隨着它依靠自己的資源和通過自己的努力而強大起來，今天的世界正在按照新的式樣在改造，而與此同時，腐朽的同盟和統治勢力正在衰落、解體。不承認這種變化的速度和廣度，並不能使將來必然發生的事情不致發生，只能使被蒙騙的人被蒙騙得稍為久些而已。

在十九世紀，傳教士、商人和官吏寫了中國的「歷史」，因而他們就成了那個時代的學者，在那個時代裏，外來的東西受到珍視，殖民征服戰爭被頌揚為聖戰。中國吸引着他們，正如埃及或亞西利亞的死去的文明也吸引着他們一樣；他們的研究致力於使這個國家的古典傳統翻新而傳之不朽，至於這個國家所經歷的變化，他們是沒有興趣去管的。因此，糟蹋中國的侵略戰爭、鴉片貿易、炮艦外交、不平等條約和大筆賠款的索取，就被改頭換面，說成是文明的使命。

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勝利的時候，西方歷史學界受到的震動是很大的，爲的是蔣介石的垮台來得很快，比美國軍人料想的還要快。接着，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是那麼快，因此，有關中國的傳統、性格、文化、落後、缺乏組織性等等老套和謬說，都要逐一扔到海裏去了。捏造的歷史突然被扯破，刺激了一大批書籍的出版，這些書籍本質上是辯解性的，力圖解釋西方（那時候「西方」就是「美國」的同義語）在中國失敗的原因。在過去十多年中，這樣的研究搞得很熱鬧，大批大批的資料從各個大學和研究中心送出來，即使它們的估價是建立在一廂願的基礎上，而不是通過實際的觀察。然而，在中國高速度向前邁進（這是中國進步的特點）的情況下，這些著作中的大部份，不是顯得已經過時，就是給論點剛好同它們相反的著作所代替。這些研究中的大部份，其弱點在於讓它們所追求的中國靜止不動的想頭先入爲主，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去評價中國正在取得的長足進步。

當今世界事態發展的主要趨勢，同西方國家統治亞洲的野心是背道而馳的。一個新世界模型正在形成，它最突出的特徵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崛起。

我們必須考慮到，西方國家對中國現實的反應依然爲這樣一個前提所決定，即地球哪個角落還沒有被西方國家侵佔，哪裏就存在着「權力真空」，西方國家在歐洲或美國的國

界外存在是正常世界的正常特點這個想頭，是不正常的。

在曾經淪爲殖民地的國家的人民中，沒有充分地得到講授的科目是歷史。今天，在許多「獨立的」非洲國家中，依然以歐洲入侵非洲作爲文化的開端。中國的知識分子避免了完全的精神屈服，爲的是他們有着自己源遠流長並富於反抗性的歷史傳統，這種歷史傳統有書可據，是世界上最廣泛和歷時最久的。中國通過幾十年鬥爭所積累起來的革命知識，如紅色革命根據地、中日戰爭，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都可供一切要求解放自己的民族學習。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在過去五十年中所進行的革命，構成了歷史經驗的基礎，這種經驗現在可以傳給別人，作爲他們鬧革命的指導原則，並使中國的歷史成了世界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的歷史研究展開了新的前景。數千個各級機構建立起來，從事史料的收集和評價，並對歷史問題進行研究。有關十九世紀許多重大事件的出版物，如關於太平天國的，捻軍的，義和團的，一八九八年改良主義運動的，辛亥革命的。歷史博物館在各個主要城市和省會裏紛紛建立起來。爲了填補解放前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這段沸騰歲月的空白，發起了一個收集個人回憶錄的全國性運動，現在，已經收集起來的回憶錄達二百萬份，這是歷史資料的巨大、主要來源。

在中國，對歷史發展的研究，不再是只有學者派頭的人的特權，而是全體中國人民自覺擔當起來的任務（識字的人，差不多個個都在學習毛主席著作，在這些著作中，載有一系列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文件，這些文件是關於過去四十年的革命的）；中國共產黨致力於消除人的無知狀態，其辦法是讓人民曉得他們自己是同歷史過程密切相連的，它們甚至能够創造並指導歷史的發展，由於物質世界迅速地起變化，無知會使人思想、態度和行動依然受到過去時代的束縛。對世界上正在起作用的歷史力量加深理解，這樣做本身就會加速歷史的發展過程，因為不願意變革的思想減少了。

就是這樣，對歷史的研究，成了一股創造將來的力量，它喚起人們對重大事件的更深認識，「幫助人們從精神的奴役中掙脫出來，解放思想。」

正是這種研究歷史和創造歷史的任務，積極地推動着每一個人投身於自己的時代；不是作為過去的批判者就是作為將來的創造者，這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在進行了，「七億批判家，七億政治家，七億毛澤東思想的學生」，正被教育在歷史的力量中認識自己，並參加進去，以便促進歷史過程的發生。在這種自覺推動時代車輪前進的情況下，關於一個世界永遠受一種優越的西方「文明」統治的傳說，關於下等人和卑屈者要受西方技術成就教誨的見解，正在遭到了挑戰，遭到了有力的抨擊。毛主席說的「東風壓倒西風」和「帝國主

「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表明美國反覆要統治亞洲大陸的圖謀注定失敗，哪怕是在亞洲海岸抓住幾塊比較小的土地。

亞洲的歷史必須重新評價，重大的事件必須由亞洲人民自己根據獨立運動的發展重新解釋。過去殖民主義的剝削，以及它現在屢屢想通過軍事手段強施統治的圖謀，必須系統地加以反映。抗擊殖民主義的洪濤巨浪，在十九世紀曾經把亞洲變成一個空前激戰的戰場，對於這，必須重新研究，特別是農民起義的形式。

十九世紀中葉，亞洲各國都爆發了農民起義，這些起義具有連鎖性影響，在時間上都接合在一起。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七年中國的太平天國和捻軍，一八五七至一八五九年的印度起義，以及一八四四至一八五二年的波斯起義，形成了一個造反浪潮；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民族解放鬥爭又有了新的高漲，如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一年在波斯，一八九一年在印度的阿薩姆和曼尼普爾，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印度的鐵拉克運動，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八年在越南，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五年在朝鮮，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年在土耳其和菲律賓，以及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在中國。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失敗後，亞洲又爆發了一連串的起義，如一九一一年由孫中山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八年印度的全印國民大會，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一年的波斯起義，以及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的土耳其

起義。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預告了又一次革命運動的高漲，如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以及在歐洲、越南和印度爆發的革命。一九四九年，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獲得了勝利，與此同時，在馬來亞、緬甸、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和非洲，也爆發了一系列起義。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戰爭、和騷動一直沒有停止過，而且增加了。今天，亞洲已經成了世界上革命性變化的焦點，舊的剝削制度和新的民族運動之間矛盾的尖銳性，集中在越南；明天，新的或更加劇烈的震盪，可能就在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發生；儘管革命的政黨可能遭到挫折，但是世界的震盪還是繼續下去；叢林之火是決不會真的被弄熄的。獲得了革命勝利的中國，正在自覺地進入世界舞台，作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其他國家革命運動的先鋒和嚮導，這些地區被稱作所謂「未開發」地區，人口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一向被人瞧不起。

二十世紀頭五十年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同另外一種力量——社會主義革命力量會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革命力量以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作為開端。這兩種力量構成了現代世界歷史的主流，支配着每一個國家的歷史發展過程，在一個國家裏，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同時發生就是相隔一段時間發生。產生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今天的「未開發」國家中是完全行不通的。根據毛主席說的，西方帝國主義的

强大壟斷資本勢力，是決不容許在亞洲或非洲的國家中產生與它相匹的勁敵的；它將對任何其他國家的獨立資本主義施加鎮壓、破壞，或者是加以收買，就像它過去在中國作過的一樣。因此，爭取獨立（這是說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的鬥爭，一定要通過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建立，才能取得勝利，否則，這種獨立就是有名無實的獨立，它繼續遭受西方帝國主義經濟、文化奴役的禍害——這種情況在今天許多所謂獨立國家中是很普遍的。

中國在民族解放鬥爭和建設社會主義鬥爭的各個階段所積累起來的經驗，現在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學說，世界上所有的革命政黨可以隨時採用，作為自己行動的指針。這套完整的革命經驗，叫做「當代最高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或者叫做「毛澤東思想」。按照中國對歷史發展情況的估計，今後三十年，世界上的武裝起義，其數量、深度和廣度將會增加，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飢餓、貧窮和剝削的繼續，播下了越來越多造反的種子；中國的經驗，它對世界革命運動的積極支持和援助，將有助於鬥爭時間的縮短和犧牲的減少。在過去十多年中，中國自己預料到了別人要搞「防疫線」，不斷對它進行威脅和挑釁，這種威脅和挑釁以美國在越南出現而達到了頂點，這裏是中國的門口，美國却派遣了五十萬軍隊和一支艦隊到這裏來，這是它企圖襲擊中國的先聲。中國已經接受了挑戰了。

與採取軍事措施的同時，美國許下諾言說，一俟「和平」恢復，一俟「共產主義」被

摧毁或者是受到了抑制，一個富足而幸福的新時代，就會在千百萬忍飢挨餓的亞洲人面前出現了。然而，沒有多少個亞洲人依然會相信這些動聽的諾言的。印度的例子太明顯了，它是世界上接受「援助」最多的一個國家呐。亞洲人在尋求比較友好的貿易或援助時，所忍受的屈辱，是很辛酸的；儘管統治階層的頭面人物是奴顏婢膝的，但是，他們自己國家內的人民却變得越來越富於鬥爭性。中國人說，鬥爭的結局不是由大批大批的武器決定的，不管這些武器怎樣具有毀滅性，鬥爭的結局是由當地富於自覺性的人民羣衆決定的，人民投身鬥爭，決心進行暴力反抗，在你死我活的搏鬥中，他們緊握手中武器，保衛自己。

在這樣的鬥爭中，有政治覺悟的人民，由忠心耿耿的革命政黨領導的人民，將獲得最後勝利；因為思想和人，比任何最可怕的武器都要高強。中國人對今後幾十年歷史發展進程的觀點，其精神實質就是這樣。

亞洲的人民羣衆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任務，意識到自己所負的責任，認識到自己有權利作自己前途的主人，因之而覺醒，因之而奮起，在這場鬥爭中，他們這樣作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世界歷史不可預測的全新時期（我在這裏推衍了巴勒克拉夫在他的《現代史概論》說的話）已經開始了。在形成世界歷史的這個全新時期中，中國的力量，中國的人民，中國的社會制度，以及它的歷史眼光，肯定是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歷史的要素，是農民起義所起的作用，這同歐洲中世紀農民起義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農民在老朽的剝削制度下過活，使用沒有效率的工具勞動，辛辛苦苦來維持生活，這種情況，今天繼續在印度、印度尼西亞、南越美阮控制區、伊朗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同樣的情況，在中國持續了二千五百年，到一九四九年才告終結。有一些歷史學家，把由公元前八四一年至公元前二二一年這段時期定為中國的封建時期，並說隨着中國國家的統一（公元前第三世紀），「封建主義就消失了」。但是，如果我們像馬列主義歷史學家那樣作，根據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來給封建制度下定義，而不管當時掌權的是貴族還是別的階級，那末，我們就總得要承認：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業人口，在租地、交付地租和強迫勞役的制度下生活，同歐洲封建時代的情況本質上並無二致，這的確就是封建主義社會的本質。

中國的歷史記載了廣泛的農民起義事件，其中大規模的有十八次，小規模的有幾百次。在中國，並沒有像在英國或法國那樣，發生過由中世過渡到近世的文藝復興，在英國和法國，城市商人階級的資本積累，使得他們有能力去摧毀或取消封建王權，並以自己的資產階級民主取代之。當資本主義來到中國的時候，它是外國的資本主義，而不是中國的。

文獻上記載的中國最早的一次農民起義，是在公元前二〇九年發生；最近的農民起義（在現代史開始以前），則是十九世紀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捻軍起義。

在現代，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革命，就稱作大革命或土地革命。一九二七年，毛主席親自領導了農民秋收起義（在此以前，毛主席曾領導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毛主席指出，這些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對今天來說同樣正確，因為正在進行中的世界革命，是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未開發」世界的「農民」，通過襲擊「城市」，或者是說襲擊西方世界的都會而進行的。

對於農民造反，封建統治者是很敏感的，他們分析農民造反的原因，通過奸巧的改良主義措施，以求得王座免於傾覆。已經做了官的讀書人，為了安撫農民，則獻策豁免租稅和勞役。特別是在旱災或水災的時候，在「好官」的勸告下，對農民減收了一些地租。但是，這並沒有改變地主階級殘民以逞的實質，並沒有改變封建制度的驚人壓迫。歷史書有著這樣的記載：公元十七年，大旱，農民王匡、王鳳，組了一支軍隊，向地主發動進攻，公元一八四年，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名為黃巾起義，搖撼了東漢政權，終於使它覆滅。公元六一七年，隋煬帝統治時代，由於他強迫人民服勞役，農民起義又爆發了。在收穫季節中，強迫勞役奪去了幾百萬農業勞動力，甚至婦女也被拉了去。封建統治者向